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曲青山

四川 改革开放 口述史

刘晓晨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曲青山

四川改革开放口述史

刘晓晨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改革开放口述史 / 刘晓晨主编.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12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

ISBN 978-7-5098-4961-3

I. ①四… II. ①刘… III. ①改革开放—历史—四川
IV. ①D61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0572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贾京玉

复 审: 吴江

终 审: 汪晓军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谷智宇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字 数: 303千字

印 张: 20.5

印 数: 1—2050册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4961-3

定 价: 46.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197

目 录

- 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 杨汝岱 / 1
- 20世纪90年代四川的改革发展
- 谢世杰 曹正其 赵国良 / 10
- 世纪之初四川“三个转变”和党建工作 张学忠 / 41
-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改革开放的
- 回顾与思考 宋宝瑞 / 58
- 西部大开发 生态保护为先 张中伟 / 71
- 我所知道的新津民营经济党建工作 吴文全 / 82
- 改革开放初期新津个体私营经济的起步 钟光林 / 92
- 走向世界的自贡国际恐龙灯会 胡德思 / 101
- 我见证了二滩水电站建设的整个历程 韩国宾 / 112
-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来龙去脉 何富本 / 121
- 我所经历的攀枝花机场建设始末 秦万祥 / 129
- 广汉农村改革溯源 常光南 / 139
- 德阳建市和建市初期推进改革开放的几件大事 沈国俊 / 151
- 中国（绵阳）科技城的建立 杨海清 / 160

- 我所亲历的绵阳建市经过 赵文定 / 167
- 艰辛历程兰渝路 赵均国 / 177
- 遂宁市蓬溪县群利公社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探索 邓天元 / 193
- 峨眉山——乐山大佛申报世界遗产经过
宋云槐 唐明中 / 206
- 探索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宜宾模式”
孙文启 高万权 张明泉 肖健康 / 215
- 广安建区之初的峥嵘岁月 唐益财 / 231
- 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大竹模式” 熊长富 吴季明 / 239
- 扶贫攻坚中的“巴中经验”
王吉安 梁廷寿 杨继孝 王 伟 何国章 / 251
- 我所亲历的“4·20”芦山地震 宋开慧 / 262
- 组建眉山地区和眉山撤地设市 李吉荣 / 274
- 冲破思想束缚开展甘孜州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 钦 绕 / 282
- 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大放光彩 阿什老轨 / 290
- 回顾西昌邛海湿地的打造 邓显祥 / 297
- 凉山州天然林禁伐与保护工作历程回顾 肖光成 / 312
- 后记 / 322

四川改革开放的起步与扶贫工作

杨汝岱

四川改革开放是这样开始的

农村改革就是包产到户。我是1977年底到省里主管农业农村工作，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给我反映，有一个地方搞定产到组，我就给省委报告这个事情。省委确认这个事情后，就派了省里面的工作组到广汉金鱼公社调查，后面同意试点。1978年，金鱼公社就全面搞包产到组，开始试点。

广汉他们自发地搞了这么一个，那时候不敢说包产，说的是定产，定产到组，没有想到后面影响那么大。到了1979年，省里面就全面推广包产到组，边远、分散、山区都搞包产到组。省上的通知下去后，全省就干起来了，都很积极。

这时候有一个叫张浩的河南人，他在甘肃工作，回老家看到搞包产到组，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质疑包产到组。这封信被3月15日《人民日报》登出来了。《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支持张浩的观点，这立刻引起了已推行农村改革地区的疑虑。但四川省委很坚定，没有动摇，三天后就发出通知，再次肯定金鱼公社的办法，稳定群众情

绪。这样，全省粮食就迎来了一个大增产。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因为干旱，搞了大包干，粮食出现明显增产。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农村的改革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四川大力推行“放宽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到组、到户的责任制，纠正一些地方对群众自发实行包产到户进行所谓“纠偏”的做法，增强了改革的信心，全省粮食总产量步步登高，1977年、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口粮比1976年分别增长了17%和33.6%。四川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为全国的农村改革提供了经验，做出了贡献。

全省城市的改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搞企业扩大自主权开始。当时扩大企业自主权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体制问题，要改变计划体制。当然，那时候中央也支持，四川省带头搞，叫扩大企业自主权。

这时四川三线建设的企业也很困难，不改不行。刚好邓小平1983年肯定了深圳的改革。我5月2号就带上省里有关部门领导，到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经济特区以及广州、海南、福州等地考察，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以促进四川各级干部解放思想和加快四川改革开放的步伐。回来后，就提出四川人要走出去，企业要走出去，特别是三线企业、军工企业要走出去，劳动力要走出去，所以就提出“借船出海、借边出境”的对外开放方针。1985年、1986年和1987年，四川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省外的销售收入增长都是10%以上，所以企业走出去很重要。劳动力也要走出去，“借船出海、借边出境”是一个大方针，四川是人口大省，因此当时必须提倡劳动力走出去。有段时间报纸上就说这是“盲流”，批评这个“盲流”。我当时就说什么叫“盲流”，四川不能说“盲流”，而应该是说“一江春水向东流”，出去了还会回来的，不要怕，所以劳动力转移出去了很多。比如仁寿县，原来非农人口只有3万，现在是35万，大部分就是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来创业了。

提出“城乡一盘棋，工业两手抓，农村三句话” 的全省工作思路

1956年起，我开始担任仁寿县委副书记、书记，到1976年底，干了20年。1977年我调到乐山地区，做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只干了一年。1977年12月省革委会开会，我被选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谭启龙同志1980年3月接任省委第一书记，1982年就把我选为常务书记，准备接班。但没有想到，谭启龙同志和鲁大东同志1982年就给中央写了封信，说现在可以交班，所以1982年底我就担任省委书记了，一干就是12个年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范围内地方干部第一个当省委书记的就是我，这对当时全国选拔年轻人担任干部起了推动作用。

我到了省里面怎么抓工作呢？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城乡一盘棋，工业两手抓，农村三句话”，即把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包括乡镇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一盘棋来统筹考虑；工业上一手抓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手抓发展乡镇企业；农业上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后来又主持谋划了“依托两市（成都、重庆）、先抓两线（沿盆地内两条主要交通干线的市县）、开发两翼（川东三峡库区和攀西川南资源区）、带动全省经济上台阶”的区域经济战略布局。针对四川的地缘特点，开展了“盆地意识”大讨论，提出并实行了“借船出海、借边出境”的对外开放方针。在四川的倡导下，川、桂、滇、黔、藏五省（区）和成、渝两市联合起来，共建出海大通道，联合走向东南亚，形成、坚持并完善了定期召开经济协调会的制度。这些政策都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推动了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开放合作。其后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和方针符合四川省情，对四川一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发展林业，保护生态

农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四川过去在大办钢铁、大办食堂过程中大量砍树，森林破坏得非常严重，我到省里后参加的第一个现场会，就是到珙县，研究发展林业、保护生态的问题。

四川森林植被遭严重破坏，既是自然生态恶化的要害所在，又是广大农民长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那时候省里面很多森工队，他们的工作就是砍树，包括九寨沟里都有一个森工队。所以要恢复林业怎么办呢，就是两条措施，一个措施是把森工队逐步取消，减少采伐，但减少采伐有一个过程，就是人员安置，逐步转产，比如九寨沟能保护的那么好，就是因为把森工队取消了。这是个大工程，有一部分森工转为造林，有些地方进行转产、转业。

再一个措施就是大搞植树造林。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大搞植树造林，主要经验就是三条。第一，在指导思想，我们认真贯彻“依靠社队集体造林为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并鼓励社员个人植树”的方针，国家、集体、个人都来兴办林业。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不够的，没有真正做到依靠集体为主，忽视了生产队和群众的利益，对社员个人植树不是鼓励，而是横加限制，甚至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集体和群众生产木材和林副产品得不到多少利益，挫伤了积极性。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要加快造林步伐，提高成效，必须依靠社队集体和广大社员，必须与他们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参加林业建设的积极性。

第二，加快内地林业建设主要还是靠落实政策。在近郊、近山、近坡、近滩植树造林，最主要的办法还是落实政策，确定所有制，确定责任制，确定收益政策，要放手干，放手落实政策。林业生产的周期性强，群众眼前没有多大收益，更要靠政策。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基层干部和群众都被整怕了，农民怕政策变，一有风声，就要砍

树。我们认真汲取这个教训，所以我们当时强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相关政策，既要落实也要稳定，政策落实了就要稳定下来，不要随意变动。

在落实林木所有权上，适当放宽社员房前屋后植树种竹的范围，按照自然界限和历史习惯明确划定，宽就宽点，窄就窄点，不强求一律。对大院子中有些社员房前屋后很窄没有地方栽树的，有条件的地方可由生产队指定地方栽树。过去已经划了自留山的，不再变动；没有划自留山而又有条件的，在不影响集体林业发展的前提下，划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山植树造林，林木产品归社员个人所有。社队之间的宜林荒山界限明确划断，限期造林，实行社造社有，合造共有。一些无林地资源的社队，则与宜林荒山较多而自己又无力全部造林的社队签订合同，合作造林，实行收益分成。零星分散小片的公有林，即原来的乡有林、村有林，除风景林、古迹、珍贵树木、防护林等外，在有利于保护管理的前提下，可划给当地社、队所有。国有的不便管理的小片林地，委托当地社队经营，签订合同，收益分成。国家和集体的林权界限，有争议的地方，本着既有利于调动社队造林护林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保护国有林木的精神，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国有荒山荒地，国家近期无力造林的，可由附近社队造林，地权不变，林木归社队所有，但不准开荒种粮或改作它用；也可以实行国社合造，比例分成，社队多得；也可以划一些给附近的工厂、矿山、机关、部队、学校造林，谁造谁有，但不得用于搞基建或其他副业。国家、集体、个人的林权一经落实，就由县人民政府发给《林权证》，以保障国家、集体、个人的林木所有权，林权归谁所有，产品由谁支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犯。

在建立健全林木管理责任制上，我们像农业上抓生产责任制那样，把林木管理责任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了。责任制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公社、大队的林木，可办林场或组织专业队、专业组管理。生产队的林木，可包给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管理；可分户管理；也可户造户管，收益分成；田边地坎、林粮间作的树木，可随同农作物一齐包到作业组管理，也可以采取其他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经济林木推行联产计酬的办法，以产量、产值或纯收入的多少，评记工分，付给报酬，实行奖惩。总之，不管采取哪种形式，都实行定包奖，签订合同，按照管理

好坏计酬，有奖有惩，落到实处，据实兑现。

落实林木所有权和管理责任制，是当时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全程在党委统一领导部署下，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力量，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当时要求全省没有落实的抓紧落实，已经落实的稳定下来，不健全的进一步健全完善。

第三，以现有林场为依托，试办林工商联合企业。国营林场和社队林场必须办好，国营林场实行企业管理，努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限期做到经费自给。国营林场办好了，就能对集体造林起到指导、示范作用。社队林场则进行整顿、巩固，由生产队投地投劳，联合兴办起来的林场先明确联办性质，处理好收益分配和场员报酬问题。联办坚持了三条原则：自愿互利，不搞互利政策是行不通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参加联办的单位真正成为企业的主要力量。国营林场和社队林场，都坚决贯彻“以林为主，多种经营，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方针，搞好经济核算，努力增加收入，逐步扩大再生产。

大搞植树造林还有一个政策，就是荒山荒坡，实行谁造归谁。你造的林就归你所有，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这样，全省生态恢复取得了明显成效，这里有一个数字，能够看到效果，80年代初期，全省森林覆盖率是11.8%，很快就提高到了后来的35.76%。总之，一个是减少森工，一个是群众性造林，这两条政策，有利于生态的恢复。

率先提出开发式扶贫

农村的改革再一条就是扶贫。当时我们到山区去调查，老百姓还非常困难，特别是川东地区，老百姓真的是非常贫苦，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养儿养女不要娇，酉秀黔彭走一遭”。

1979年，我就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土家族、苗族集居地去调研。当地的干部介绍说，这是杨书记，老百姓都说哪里有个杨书记，只有一个县革委王书记嘛，当然就更不晓得其他省领导了，信息闭塞到

了这个地步。加上是大山区，很穷，我看到那些农户简直是，晚上直接睡在地上，床都没有，当时我就下了决心。

1984年，中央还没有提出扶贫，我就专门开了一个扶贫会。当然开这个扶贫会也不是自己凭空想来的，因为胡耀邦同志1984年春节前到四川、贵州来视察，我跟谭启龙一起陪同他到贵阳，路过毕节，发现那个地方穷得很，耀邦同志就说，老百姓真的穷啊，我们仓库里有粮啊，把仓库里的粮、棉、布赊销一些给群众，解决困难户过冬的问题。在他的启示下，1984年6月3日，我到四川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调研，当时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仅半年时间，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还很薄弱，百废待举，尤其是山区农业开发，举步维艰，农村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后面我又带工作组到川东的涪陵、达县、万县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在7月31日到8月3日，召开了川东山区经济座谈会。这就是后来大家说的“秀山会议”。

秀山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研讨改变贫困山区的措施和办法，重点是研究扶贫开发。秀山会议上提出了取消粮食征购，另外还研究出了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的措施。秀山会议是四川省召开的首个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把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开发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拉开了四川省把扶贫工作由单纯生活救济式扶贫转向经济开发式扶贫的序幕。那时候中央还没有提出扶贫开发，中央是1985年提出的。所以，一些报道上说秀山会议对后来中国的扶贫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四川老区划的川东南地理位置特殊，那个地方是最贫困的一个地区，扶贫难度大，后来我说分出来嘛，从涪陵把它分出来。那里是土家族苗族，一边是湘西，另外一边是贵州，还有湖北的恩施，是不是成立一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以后来就成立一个黔江地区。后来，包括秀山在内的黔江地区宁肯苦干，不愿苦熬，很快就把农业搞上去了，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还创造了“黔江奇迹”，形成了闻名全国的“黔江精神”。我离开四川以后重走扶贫路，去了三次，十年一次，1993年去了一次，2003年去了一次，2013年我又去了一次，我看问题解决了，

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都修起来了，另外城市都是高楼大厦，农村一片片新房。

修建黑龙滩水库，结束周边十年九旱的历史

四川丘陵地区多，丘陵地区容易干旱，历史上只能广种红苕。成都之所以叫天府之国，就是因为有一个都江堰，都江堰的灌溉过去只灌川西平原，几百万亩。所以，解决丘陵地区的干旱问题关键在于加快水利建设。

兴建黑龙滩水库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那时杨超管计划，李林枝管农业，他们思想比较开放，就说是不是把都江堰的水引到丘陵地方去，解决丘陵地区的干旱问题。我记得是1963年，杨超专门来找我，说要搞东风渠四期，从成都双流的籍田继续延伸，并说东风渠修好后，就能把水引到你们丘陵地区去，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设想的。我说好呀，一下就上了3000劳动力，修东风渠四期工程。1970年我已经被解放出来了，当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了，县武装部长崔二奎是革委会主任。那时候四川丘陵地区干旱频繁，李大章就说要彻底解决干旱问题，修了东风渠还不够，还要修水库。但究竟修在哪个地方好呢？崔二奎就带着大家一起研究，开始选的是回龙水库啊，人民水库啊，都不合适，后来才确定修黑龙滩水库，设计库容为3亿立方米。

定下来后，1970年7月就开工了，我是副主任，具体工程的整个动员调配和具体组织，是我在抓。这个水库要蓄3亿立方米水，是当时四川最大的水库，人少了干不成，所以一开始就上了27000劳力修大坝，后来修干渠，又上了23000劳力。冬天就搞大突击，10万人修大坝，那时候都是群众自己带口粮，完全是义务的，就是很少一点补助。整个水库完工是在1985年，毛渠一共长3600多公里，水库修起来以后，老百姓的灌溉就解决了，后来接着就是简阳的三岔湖水库也修起来了。到丘陵地方的灌溉还是东风渠开头的，东风渠修好以后就修人民

渠，人民渠就灌三台啊，中江啊，解决了一大片丘陵地区的干旱难题。黑龙滩建成后，仁寿地区的干旱就解决了，周边几个县十年九旱的历史也结束了。现在不仅是干旱，饮水也解决了，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促进，目前黑龙滩灌溉 100 万亩农田，解决 300 万人的饮水，井研（县）的部分地方也吃这个水了，还成了景点。

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是从杨超、李林枝的设想开始的，当然是后来才得以实现。黑龙滩水库打响的第一炮，黑龙滩一修就活了，带动了后来人民渠灌溉三台和中江，天府之国的实际范围就更广了。2000 多年来，巴蜀大地的水利工程就只有都江堰，也只能灌溉川西平原，现在能灌溉到丘陵地方去了，这个巨大的变化也是从东风渠、人民渠开始的。

断断续续就讲这些。总之，当时四川在一无边二无海、三没有享受到沿海地区开放政策的情况下，就是沿着“城乡一盘棋、工业两手抓、农村三句话”“依托两市、先抓两线、开发两翼、带动全省”和“借船出海、借边出境”等工作思路打开了全省工作的新局面。

（江红英 宁志一 马善思等采访，
马善思 黄婷婷 刘全整理）

20 世纪 90 年代四川的改革发展

谢世杰 曹正其 赵国良

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毫不动摇地走稳粮增收富民之路

谢世杰：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 80% 以上，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反复强调农业的发展历来都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我在任省委书记时农村经济的繁荣，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农村稳则巴蜀安，农民富则全川富。

四川农业要持续发展，农村经济要振兴，最终都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我们制定和执行农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一直致力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和摊派，把农民税外负担限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社队经济实力。

按照中央要求，省委、省政府从四川的实际出发，对“九五”期间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三大战略任务：一是保证粮、油、肉

等主要农副产品稳定增长，粮食生产上一个新的台阶，总产量达到 960 亿斤；二是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基本实现小康，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按 1990 年不变价达到 1200 元；三是确保在 20 世纪末解决全省 8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那时要全面完成三大战略任务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当时，四川农村经济发展中难度最大的就是稳粮和增收，这是我们整个农村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差距所在。随着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刚性增加和耕地减少对粮食生产的客观抑制，稳定农业的关键难点是保护粮食生产总量的稳定增长。四川的特殊省情决定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忽视粮食生产，要千方百计确保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这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稳定的基石。在粮食发展上，我们始终坚持稳定面积、增加复种、依靠科技、主攻单产、提高质量、增加总量的路子，并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抓好四个关键措施：一是切实保护耕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5 亿亩左右；二是强化科技兴农，突出抓好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大力普及先进的种、养殖技术，使农业科技在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 40% 以上，依靠科技夺高产。三是治水兴蜀，加快以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加大中低产田土改造，增加高产稳产基本农田。四是立足抗灾夺丰收。四川灾多、灾重，要立足抗大旱，防大汛，先发制灾，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以“旱”制旱，以“水”制旱，以“早”制旱等防、避、抗、补、改相结合的措施，战胜灾害。五是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我们就注意抓农民增收，也就是说有了吃的了，就必须解决农民用钱的问题。如果光有了吃的，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民富不起来，不仅小康目标难以实现，农业也难以稳定。因此省委、省政府在分析省情和总结历史经验中确立了“稳粮调结构、增收奔小康”的发展思路，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增加收入，稳定农业与调整结构、加快发展与控制人口增长的关系，走稳粮安邦增收富民之路，以奔小康来统帅整个农村工作，努力实现粮增产、钱增收、人少生

的目标。主要是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调整种植业结构，下决心拿出一部分耕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组织农村剩余劳力进城务工、经商，开拓生财之道，增加农民收入。实际上四川农村调整结构，是先从成都平原展开，逐步向盆周山区，再向高寒地区发展的。现在，成都平原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得比较合理。但是边远山区还没有调整过来，因为离开了种粮他们还没有新的办法。调整得越早的现在收入就越高，富裕水平也就高。现在成都平原的农村，和珠三角、长三角那些地方农民的收入也差异不大。但到盆周山区、三州去看，奔小康的任务还很艰巨。

四川有 200 多个县（市、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全省经济振兴的大局，我们反复强调要因地制宜，找准路子，增添措施，加强领导，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县的统筹协调和自主发展的能力，把抓好农业、加快发展工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重点来抓，做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发展中提高、壮大经济实力，惠及百姓。经过全省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四川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局势稳定。特别是在不足全国 7% 的耕地上，生产了占全国 10% 的粮食，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农民的现金收入也在逐年增加，农村的贫困人口也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用抓农业的劲头抓工业走出一条 四川特色工业化新路子

谢世杰：四川省当时的工业生产是比较困难的，工业上不仅存在着“三多两低”的不合理现状，即：四川的重工业多，轻工业粗加工多，军工企业多；技术装备总体水平低，规模经济水平低，竞争能力弱，结构调整比较缓慢，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投入严重不足，支柱产业还未真正形成，拳头产品很少，而且企业亏损面很大。全省预算内国有工业亏损面约为 60%，县属国有工业亏损面高达 80% 以上，有 2/3 左右